

尤·米·洛特曼符号学中 文化类型学描述的元语言^{*}

[俄]阿·克·伊·扎布利奥尼译 管月娥译

摘要 本文探讨了洛特曼文化理论的“符号域”概念和文化类型学描述的元语言的形成过程,对其结构主义特征展开分析,同时将之与法国结构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和福柯的经典概念进行对比,并在不同的哲学和方法论思想流派——两者择一的科学研究方案机械论和有机论中探寻文化类型学,对洛特曼描述文化的类型学元语言的探索潜能与边界进行评价。洛特曼将“文本”理解为一种开放结构,对其概念进行了重新思考。在洛特曼看来,文本只有沉浸于符号域才能发挥作用,并以对话为前提,其特征可以通过与巴赫金的“对话”概念进行比较而彰显。巴赫金的对话交际主体是个人,持的是存在主义立场,而洛特曼的对话交际主体是语言,持的是整体性语言立场,他将关注点由个人转向文化。在对历史主义问题进行探讨时,洛特曼提出有必要创建人文知识的精确科学语言,强调文化类型学描述的元语言的工具性特征,同时还构想出两种类型学思想以建立跨文化交际的概念模型。

关键词 洛特曼 文化类型学 元语言 符号域 对话

DOI:10.16238/j.cnki.rla.2024.01.011

引言 文化类型学——俄罗斯文化学中的整体性概念和逻辑模型

尤里·米哈伊洛维奇·洛特曼(1922—1993)是20世纪俄罗斯最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化学家之一。他有关俄罗斯文化方面的著作受到学界高度评价,他的文化理论和方法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得到了探究和运用。然而,虽然洛特曼的作品名声很大,广受赞誉,但有关他对文化学基本问题,包括文化类型学问题所作的贡

献,至今还没能得到应有的充分认识。据洛特曼本人所说,他的符号域理论或者文化理论思想形成并发表在1966—1987年期间所写的系列文章中。然而,他对文化学学科建立所作贡献的意义却迟迟未被意识到,这也许是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当俄罗斯文化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刚刚开始形成之际,洛特曼已不再参与有关该学科的讨论,他于1993年去世。

^{*} 本文系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尤里·洛特曼著作集汉译与研究”(21&ZD284)的阶段性成果。

在俄罗斯文化学形成的初始阶段,各种不同的人文学科,如艺术学、文艺学、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经验。同时,这也是一个相当无序的探索阶段,当时的文化学还是一个完全没有细化的研究领域。为了使文化学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必须确立它的有别于其他人文学科领域的研究对象问题。因而,有关文化学这门新科学的争论在全国各地展开,参与其中的不乏著名学者。20世纪90年代的彼得堡辩论在彼得堡最著名的文化哲学家索洛宁(Ю.Н. Солонин)和卡冈(М.С. Каган)两位教授之间展开,这场辩论对认识文化学的研究对象这一基本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此次辩论的核心是**文化的整体性**问题。应该指出的是,文化整体性思想不仅对新学科的学科特征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它还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整合的社会因素,因为90年代是俄罗斯进行改革的年代,旧有的生活方式开始瓦解,文化的整体性和独特性及其自我价值和自我目标问题成了俄罗斯学者们思考和探寻的深层目标。在文化哲学中长期以“类型”概念表达的文化整体性思想,成为俄罗斯文化学的一个永恒话题。在这一点上,俄罗斯文化学从一开始就不同于20世纪下半叶在英国、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形成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文化的整体性问题是决定文化学学科特征的根本问题。如果失去了整体性思想,文化学就会解体为一系列人文学科,即将不再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知识领域而存在。然而,文化的整体性思想本身

只是学科特征形成过程中最初的规范性目标,因为仅仅宣布文化学认识到文化的整体性是不够的。为了建构作为理论概念的文化整体性,必须回答什么是文化的问题,即如何建构作为整体性的文化的理论概念。彼得堡辩论提出了这样几个基本问题:从本体论对象意义(而不是术语意义)看,文化学的认知对象是什么?我们如何认识?对文化的科学认知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触及本质?又能达到怎样的概括水平?最后,在文化认知中,什么是不可化约为个体的对象?正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构建了文化学独特的方法论,它们为俄罗斯文化学学科特征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有关整体性问题,即关于用“类型”概念表达的文化学基本概念“文化”的建构方式问题,在彼得堡辩论中各方力量的分布怎样呢?为了寻找文化整体性的概念表达方式,在20世纪90年代的辩论中提出了各种理解文化本质的本体论假设。卡冈提出了有关文化系统性结构,即系统整体性的本体论假设;索洛宁认为,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论战实现了西方哲学中两个在18世纪末就开始竞争的科学方案(научные программы)——机械论和有机论,形成了两个极端的两者择一的科学方案,它们在很多方面决定了现代俄罗斯文化学的学科轮廓。

如果谈到文化学研究实践中这两种可供选择的科学方案的接受问题,那么相较于有机论,系统方法现今在俄罗斯文化研究中有许多追随者。这是因为系

统方法早就在自然科学的不同领域得到运用,并有一套已运用到文化学并适应其学科领域的完善的概念体系。然而,如今它在文化研究中的弱点也是众所周知:1)这种方法设定所有文化和文明具有共同的系统结构,而合理创建的类型—系统概念对文化和文明的独特参数并不敏感;2)在构建文化宇宙时,系统方法提出对世界历史进行层系划分(即将历史分成若干阶段,所有文明和文化都具有这些阶段的共性)。这些弱点在对非欧洲文明的研究中尤显突出。东方学家认为,建立在系统方法基础之上的理论文化学的全部概念和方法在印度学、汉学和非洲学研究中是不适用的。

因而,近来由索洛宁提出的“有机论”科学研究方案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由于整体性本体论源于歌德(И.В. Гете)的自然哲学,而正是歌德提出了极具前景的类型学方法的思想 and “类型”概念,所以索洛宁将这一科学方案称为文化研究中的“歌德路线”。20世纪初,将这一方案在文化研究中广泛运用的是施本格勒(О. Шпенглер)的文化哲学,他用包含不同内容的原型来表达独特的文化(类型)。施本格勒的宗旨是不表达外在的系统关系,而是表达文化的形而上学,即决定具体文化的所有现存形式和现象的文化本质参数。然而,表达文化形而上学的概念系统至今仍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这使得该方案的思想很难深入到科学研究的实践之中。

机械论(一种理性主义的、系统量化的科学研究方案)和有机论(一种定性的科学研究方案,旨在对文化独特性较为

敏感的概念系统展开深入研究)是两种相互竞争但在认识方面又相互补充的科学研究方案,今天对这两种方案探索潜力的挖掘正引起人们的关注,并得到广泛讨论。^{[1](145-183)}

这两个科学研究方案提出了不同的文化整体性思想和逻辑模式,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文化学作为一门新科学的学科框架。如果在这两个科学研究方案的背景下审视洛特曼的文化概念,那么很显然,洛特曼提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建构文化学基本概念——“文化”的方法,这决定了他研究的是另一种问题,并采用了根本不同的文化宇宙研究视角,而且洛特曼研究文化类型学问题的方法不属于两种供选择的方案当中的任何一种。为了揭示文化类型学描述的元语言特征,本文将重构洛特曼符号域理论的内在联系,并由此提出类型学问题,以及讨论他的文化观念(洛特曼将其运用于文化认知和有关文化和文明类型学问题的一般探索思想活动)的发展潜力。

一、符号域理论的形成: 交际行为及其两种类型

(一)从文艺学到文化理论

洛特曼的“文化”概念和符号域思想萌芽于他的文学理论研究。洛特曼以文艺学家和理论家的身份,基于结构主义思想和结构语言学方法,确立了他的文本概念和所创立的文学研究新方法。上世纪60年代,他就创立了文学研究的新方法

(《结构诗学讲义》一书),且从1963年起开办了“第二性模拟系统”暑期学校(塔尔图—莫斯科结构主义得以创建),并最终于60年代后半期在《文学研究应该是一门科学》(1967)^{[2](90-100)}的纲领性文章中,基于以下三个论点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纲领:1)艺术作品不是特征的总和,而是一个功能系统,一种结构(确立了结构主义的基本原则——拒绝按照列举特征的原则进行分析);2)结构主义不是历史主义的对立面,对任何一种现象既可以作为某一时时间点的既定系统进行(共时)研究,也可以从渊源和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历时)研究;3)研究者应该集文艺学家、语言学家和数学家于一身。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洛特曼的结构符号学分析对象是文学。在《艺术文本结构》^{[3](13-285)}一书中,洛特曼在运用其结构符号学方法分析文学作品的同时,还使该方法至臻完美。正是在这部作品中,洛特曼从文学完全转向了文本,他将文本视为第二性模拟系统,而模拟自然的自然语言是第一性模拟系统。文本作为第二性模拟系统,建立在自然语言基础之上,因而在文本中存在某些自然语言中所没有的东西,所以,要理解文本光有作为第一性模拟系统的自然语言知识是不够的。这样一来,对于洛特曼来说,文本成了比文学作品更为重要的概念,虽然文学作品存在体裁的多样性、历史发展性或民族的原创性。洛特曼感兴趣的是不变的文本法则,即在功能上主导所有个体和历史特性的结构。

没有语境的文本是不存在的,由此洛

特曼对文化问题产生了兴趣。对文化的转向伴随着对文本这一基本概念的重新认识。洛特曼开始将文本视为一个开放的结构,并非常清楚地指出了其早期和晚期的区别:“现代结构分析和形式主义与早期结构研究的本质区别在于强调了分析对象。上述流派的基石是有关独立的、孤立的、稳定自足的文本的概念。文本既是研究的常项,也是研究的起点和终点。文本概念本质上是先验的。”^{[4](102)}洛特曼将文本概念重新解释为一种开放的结构:“传统结构主义从俄国形式主义者形成的原则出发,认为文本是一个封闭、自足、同步组织的系统。它不仅在时间上与过去和将来隔绝,而且在空间上也与文本接受者和外部的一切隔绝。”^{[4](22)}洛特曼在此将文本视为是文本创作者和接受者观点的交汇。在《作为意义生成机制的文本》一文中,他指出:“文本与其接受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彼此作用为特征:文本试图将受众比作自己,将自己的代码系统强加于受众,而受众则以同样的方式回应文本。”^{[5](203)}但仅此还不够,新的文本概念要求将文本置于与符号域的功能关系中。洛特曼强调,将文本仅仅重新理解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即传达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对话)还不够,因为孤立的机制不起作用。文本只有沉浸于文化,即符号域之中,才开始发挥作用。因此,摆在洛特曼面前的任务是从理论上模拟符号域——一个异质的符号空间,由不同语言组织起来的复杂整体。只有在这个整体中,创造文本的机制才能发挥作用,交际行为得以进行。洛特曼写道:“许多系统与其他系统相互

碰撞,并迅速地改变自身的面貌和活动轨迹。符号空间充满了自由移动的各种结构的碎片,不过这些结构在自身还稳固地保留关于整体(其类型——本文作者)的记忆,并在进入他人空间时能够一下子迅速地修复。符号系统在符号域中相互碰撞时显示出生存和转化的能力,就像普罗透斯(Протей)一样,能够成为他人的同时保持自己,因此,谈论此空间中的某个东西完全消失时应该特别小心。”^{[4](101)}

洛特曼在《文本与功能》一文中指出,在分析文化研究中的两个基本概念——**文本**和**功能**时,他参考的是皮亚季戈尔斯基(А.М. Пятигорский)的一篇文章。^[6]“在文化研究中**文本**概念被赋予的意义不同于相应的语言学概念。文化的文本概念正是始于语言表达的事实不再被认为是足以使语篇成为文本的时候。”^{[4](434)}

因此,在第二阶段,洛特曼正是通过“文本”这一概念,从作为文学艺术文本的文本概念过渡到了其他文化形式的文本:神话、仪式、造型艺术、戏剧、电影、时装,最后是文化本身。洛特曼将理解为文本系统,或者更准确地说,理解为文本的文化称为符号域,而在文学研究中运用过的结构符号学方法开始被认为具有普适性,并被用于文化研究。洛特曼在引入“符号域”(与В.И. 维尔纳茨基的“生物圈”相类比)概念时,不仅强调了符号域对于交际行为的首要地位,还强调了其完整性:“可以将符号宇宙看成是由一系列独立文本和彼此封闭的语言构成的整体,那么整个大厦看上去就像由一块块砖组成的建筑。然而,更为有效的是相反的方法:整

个符号空间可以被视为一个单一的机制(如果不能被看作有机体的话)。在这种情况下,首要的不是某个组成部分,而是‘大系统’。符号域是一个符号空间,脱离此空间不可能存在符号意义的阐释过程。”^{[7](13)}

(二)作为开放结构的文本: 交际行为及其主体

在洛特曼符号学中对文本概念的重新认识伴随着对交际行为的重新思考。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正如叶斯柏森(O. Есперсен)所指出的,对话主义传统特别强调个体间的交往是人类集体创建某种整体性的重要基础,因此对语言和交际行为的研究吸引了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的关注。同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普遍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仅仅是由他们在交际行为中的角色决定的。^{[8](15)} 研究者们没有注意到,在不同的交际场合,对语言的理解不仅取决于说话者和听话者的角色功能,还取决于他们进行交际的背景特征,而这种背景会导致这两个人物之间的交际行为发生本质变化。

在最早发表于《塔尔图大学学术论丛》^{[9](5-23)}的《论符号域》一文中,洛特曼重新解释了交际行为,指出对两个参与者单纯孤立的对话进行研究是站不住脚的,并设定相对于交际行为而言符号域的首要地位:“我们迄今为止的讨论都是基于普遍接受的方案:以一个单独孤立的交际行为为基础,研究由此而产生的受话人与发话人之间的关系。通过这种方法,希望对孤立事实的研究可以揭示符号意义

阐释过程的所有基本特征,而这些特征能够被进一步外推到更为复杂的符号过程。”^{[5](250)}这种观点,正如洛特曼所认为的,是相当肤浅的。“由发话人、受话人和将他们连接起来的唯一通道构成的装置还无法启动。为此,它必须进入符号空间。所有的交际参与者都必须拥有一定的经验,具备符号意义阐释的技能。这样一来,就形成一个悖论,即符号经验应该先于任何符号行为。”^{[5](250)}洛特曼强调:“符号域之外,既没有交际,也没有语言。”^{[5](250)}因此,洛特曼文化观的基本概念不是孤立的符号或者孤立的交际行为,而是被称为“符号域”的“大系统”。

洛特曼对交际行为(和对话概念)的研究转向,在许多研究者看来,是他在对话关系领域向著名权威巴赫金(М.М. Бахтин)接近的理由。比如,叶戈罗夫(Б.Ф. Егоров)一再强调洛特曼在概念上向巴赫金的靠拢。^{[10](244)}在我们看来,有关这一问题阿夫托诺莫娃(Н.С. Автономова)较为谨慎,也较为深入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当今在西方,甚至俄罗斯研究者中,非常盛行尝试将洛特曼与巴赫金紧密联系起来,以使其具有现代性,这样做的理由就是洛特曼后期对对话的新强调。”^{[11](126)}该研究者还认为:“……洛特曼虽然有迎合巴赫金之嫌,但至少向自我突破和开放结构迈出了新的一步;这一点在早期的洛特曼身上已有迹象,但晚期这些倾向更为明显。”^{[11](134)}

与巴赫金的文本和交际行为概念相比,洛特曼的交际行为的特殊性尤为明显。在对交际行为重新认识时,洛特曼将

重点由交际行为中的人物(个人)转向其背景,即文化(符号域)。因为符号域在交际行为中的首要地位而提出了主体问题:在洛特曼对话概念中,谁是交际的主体?需要强调的是,洛特曼最初倾向于结构主义和理性主义传统,将语言作为交际行为的主体。也就是说,洛特曼的主体不是个人化的,不是巴赫金在区分“文本”中的两极——结构(也是洛特曼的)和存在立场时,在对话中竭力强调的后者。洛特曼交际行为(对话)的主体不是个人,不是经验主体,而是语言。经验主体,无任是生产还是接受文本,都只是某些结构特征的载体。也就是说,进入对话的不是个人,而是一个整体立场,确切地说,是两个整体语言立场(生产文本和接受文本的立场)。交际行为中的类型学问题由此而产生。

(三)类型学和历史主义问题

在《对文本类型学问题的思考》一文中,洛特曼解释道:“在谈到文本的语义或句法分析的不足时,我们与它们作对比的不是实用主义而是功能主义的方法。推论不是这样确立的:‘文本的本质不是由语义和句法决定,而是由语用决定的’,而是这样:‘文本功能的变化赋予文本新的语义和新的句法’。”^{[5](443)}这样一来,“文本的创作者通过某些功能—类型学范畴确立文本意义,而接受者则通过其他范畴理解文本……因此,看来有必要谈谈文本的相关性,不是与某一种,而是与两种类型——创作者(传达者)和接受者——相关。”^{[5](444)}

研究者必须在理论上对对话进行建模,且不能将对话仅仅视为符号域活跃的动力源。同时,必须在认知中思考对话,也就是说,在洛特曼符号学中必须区分两个方面:作为文化中交际情境的对话(对话的本体论)和作为认知情境的对话(对话的认识论方面)。认知过程也是与作为其他语言立场的文本的一场相遇,但这里出现了科学认知的问题。基于这样的情形,洛特曼提出了历史主义原则的问题,并且是针对自然科学中对科学语言的要求。

洛特曼在和古典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科林伍德(Р.Дж. Коллингвуд / R.J. Collingwood)的辩论中表达了自己对历史主义的理解。在反思历史主义问题时,洛特曼认为,历史科学的经典方法论认为其思想是由于其他历史时代或其他文明所造成的。但是历史学家接触的不是事实和直接现实:“历史学家注定和文本打交道。在‘真实发生的’事件和历史学家之间存在着文本,这从根本上改变了科学的状况。文本总是由某个人为了某个目的而创作的,事件以编码的形式出现在文本中。历史学家首先得担任译码员。事实对他来说不是出发点,而是艰苦努力的结果。他自己创造事实,努力从文本中提取文本外的现实,从有关事件的故事中提取事件。”^{[5](336)}由此,洛特曼认为,在提出历史主义问题时,应该考虑到:1)在文化中,文本只有在其语境中才能发挥作用;2)对话是两种语言立场的碰撞,它们可以在时间上相隔久远。因此,在对历史主义的理解中,“符号学之路是相反的:

它意味着最大限度地暴露其结构中的差异,描述这些差异,并将‘理解’解释为是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翻译。不是消除研究者(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而要意识到他的存在,并最大限度地考虑其如何影响描述。因此,就像符号学研究的工具是翻译一样,类型学应该成为历史文化研究的工具,并务必考虑历史学家及其所属文化的类型(着重号系我所加——本文作者)。”^{[5](388)}

这样一来,如果不能把研究者(认知者)从认知过程中排除,那么就有必要深入研究出一种能够考虑其立场的方法论。这就是为什么在洛特曼的符号学中历史主义问题是作为两种整体立场,即两种类型学的对话来解决的,而且认知主体不是经验主体,而是“主体—语言”。

二、探寻人文知识的科学语言： 文化类型学描述的纯元语言

洛特曼一直对文化类型学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抱有兴趣,他不仅曾经在不同年代(1967—1987)为此写过系列文章,^{[12-16](3-11)}而且后来还经常在讨论其他各种不同问题时重提这些问题。至于洛特曼为什么对文化类型学研究的兴趣日益浓厚,他在《论文化类型学》一文中有所说明。洛特曼认为,类型学模式的必要性和类型化的作用首先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文学与其他种类艺术和人的精神活动的非艺术形式的比较研究中;第二,特别有效的是,能够模拟、阐释在时间上相隔较远或种族差异明显的文学的本质,

同时并不是把它作为一组稀奇古怪的谬论,而是作为有机的、合乎内在逻辑的艺术和思想的结构呈现出来。^{[5](447)}

洛特曼在早期创作阶段就产生了对作为科学语言的类型学的需求。众所周知,结构主义的形成就是追求科学的严谨性和客观性理想的结果,这种理想源于新时代的古典理性主义,而在新时代,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密切起来,并以精确自然科学的模式为导向。洛特曼激进地追求客观主义理想和人文知识的科学性,他写到:“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存在着同样的一个问题——语言问题,即描述的元语言和被描述的对象之间的相互作用问题。……语言问题涉及所有学科。事实上,情况是这样的:科学在文艺复兴之后的发展形式是以笛卡尔和牛顿的思想为基础的,其出发点是科学家是外部观察者,从外部观察对象,因此拥有绝对‘客观’的知识。现代科学的各个领域,从核物理到语言学,都认为科学家处于他所描述的世界之中,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但是对象和观察者通常用不同的语言来描述,因此,翻译问题作为一项普遍的科学任务出现了。”^{[5](386)}

洛特曼引入两种类型学(两种整体观),意在寻求一种解决方案,以考虑到认知主体在认知过程中的不可或缺性,并提高人文知识的客观度。在《论文化类型学描述的元语言》(1968)一文中,洛特曼提出了创建用于文化类型学描述的科学语言的任务,此种语言能够像精密科学一样,在内容上与被研究对象的语言不相吻合。他试图在空间模型,特别是拓扑学理

论的基础上构建这样一种元语言,拓扑学是一门数学学科,研究在同构变换的情况下不发生变化的图形的特性。^{[5](464-465)}这样一来,洛特曼就将类型学方法与理论上对实物环境的模拟结合了起来。什么是文化的普遍模式——一种在概念上已得到深入研究的符号空间结构?

在确定符号科学的研究对象时,洛特曼强调:“从研究者的角度看,将文化理解为‘创造所有文本的机制’,而将文本理解为‘文化的实现’更为确切。”^{[5](333)}研究者直接与文本打交道,但为了认识文本背后的现实,就必须理解文本的生成机制。为此,他需要以理论的形式建构文本生成的机制本身。在《关于文化类型学的几点思考》和《类型学视角下的叙事文本》两篇文章中,洛特曼对属于前文字文化和文字文化的文本进行了分析和比较。他注意到了这些文化文本的两种记忆类型以及相关的不同符号性质。从历史角度看,前文字文化是排在首位的,与之相应的是循环文本生成机制,其创立的是合乎规律的世界图景,并在其独立的领域之间建立统一性。文字文化具有不一样的文本生成机制,该机制按照线性的时间运动方式进行组织,且确定的并非是规律性,而是“异常”。

洛特曼谈到了两种文化类型,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两种文本生成机制类型和两种符号类型。它们是完全相反的型式。然而,实际上我们得在同一文化内区分口头和书面范围。^{[5](109)}因此,根据洛特曼的观点,我们谈论的不是任何现实的文化,而是不同的类型学原则。^{[17](75)}在每种文化中都有两种相互冲突的体系在起作用,

它们不会彼此消除,而是相互形成结构关系。每种文化的真正机制都意味着两种结构组织类型的存在、它们之间的相互张力和对话冲突。^{[17](236)}现代叙事文本是这两种类型学原始机制相互作用和影响的产物。^{[17](226)}一组描述世界结构或者构造的子文本意味着循环文本生成机制。对特定文本的空间描述可以作为研究者就特定世界模型进行谈论的元语言。文本中的静态成分说明了世界的宇宙学、地理学、社会学和其他结构的特征,所有这些都可用“主人公环境”这一概念统一起来,并用拓扑图来描述。另一种文本生成机制(结构)是根据线性的时间流动方式组织,它记录的不是规律性,而是过度的无节制。作为与世界结构进行斗争的情节提要出现了。动态子群描述了某个主体在连续统内部的运动,而连续统的结构特征则体现在第一子群的文本中。第二子群的文本与第一子群文本不同的就是情节性。描写情节的工具可以是与点移动轨迹相关的拓扑概念,特别是图论。这组子文本说明了人在周围世界中的地点、位置和活动特征,也就是说,它与主人公相关。主人公是文本的动态成分,他有自己的路径,在作为他的世界的那个普遍空间内进行活动。活跃的主人公潜藏着破坏世界既定结构的可能性。

这两个对立子文本,即两种文本生成机制,由拓扑图形和拓扑轨迹描述,在同构变换的情况下不会改变。洛特曼将它们统一到一元的统一体中,并以此建构了一个普遍的文化模型(普遍的文本生成机制)。一元体或者普遍文化模型是一种类

型。在一元体中两种文本生成机制处于镜像对称关系中。^{[17](36-37)}这样的镜像对称(对映异构形态),两部分像照镜子般对等,但叠加时却不相等,可以产生相关差异,这种差异既有别于同一——使作为意义生成基础的对话变得无用,也有别于不相关差异——使对话变得不可能。

文化的普遍模型或者机制,一方面可以对文化进行类型学描述,另一方面它又是纯粹的科学语言,也就是说,满足了不把一种文化的观念和概念移植到另一种文化的要求。洛特曼引入两种类型学(两种整体观),并将类型作为一种普遍模式(普遍的文本生成机制),即一种描述的纯语言,进行建构,他成功地既考虑了认知主体,又提高了人文知识的客观度。然而这种文化类型学描述的元语言的探索潜力和局限性如何呢?

三、洛特曼描述文化的类型学元语言： 潜能与边界

洛特曼文化类型学描述的元语言应该模拟的是符号域的整体性。古谢夫(C.C. Гусев)是一位对社会交际过程进行过最深入研究的作者之一,他研究社会中交际逻辑的逻辑哲学、语言心理学和理论认知问题。在研究交际过程的不同方面时,他注意到了洛特曼符号域概念建构的特征。古谢夫指出,洛特曼所说的“符号域”或者“符号宇宙”是指“独立文本和相互封闭的语言的集合”,并且“他认为这种集合的基本特征在于,借助该集合可以确定语言的适用边界或具体文本的语义

界限。这样就提出了某个文本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翻译边界问题。当一个文本的意义统一性在翻译中开始被破坏时,那么该文本存在的特定符号域也不复存在。”^{[18](123)} 古谢夫强调:“正如洛特曼所认为的,这种符号宇宙最重要的功能与将‘自己的’与‘他者的’分离有关,与外部(相对于这个宇宙而言)文本对其内在规律的适应有关,与对其中不存在的一切‘吸收’并将其转化为自己语言的信息有关。”^{[17](14)} 由此可见,符号域**与其说是确保彼此之间有着质的差别的文化体系的相互理解,还不如说是在消除将外来现象视为与其对立的认识的同时,促进了外来文化元素融入自身文化规范与目标的语境之中**(着重号系我所加——本文作者)。因此,符号域不是将不同文化传统联合起来,而是增强了自身的组织化程度,屏蔽了其外部现象是具有质的不同的事物的看法。”^{[18](123)} 看来古谢夫已注意到了符号域的重要特征。我们将指出,洛特曼也不止一次地强调过“不断增强的逻各斯”。这是洛特曼符号域概念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

古谢夫区分了“真正的对话和伪对话(实际交流的)”^{[18](142)} 并指出:“真正的对话会使每个参与者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这是因为谈话者进入了彼此的意义空间,从而增加了各自内心世界的内容。”^{[18](142-143)} 真正对话的出现需要一个专门组织的“文化符号空间”(即作为第三对话人的共同文化背景)。古谢夫对“符号域”(属于洛特曼的)和“符号空间”进行了比较分析,并阐明了应该将“符号域”视为符号空间

的具体情境表现的论点。^{[18](143)} “洛特曼所描述的彼此封闭的语言集合在现实交际实践中成为符号空间的子结构之一。”^{[18](123)}

在建议将洛特曼的符号域概念视为符号空间的具体情境表现时,古谢夫认为:“符号空间……可以被认为是众多被激活的符号域,它们在社会交际的不同层面进行彼此复杂的互动。”^{[18](124)} 由于作为文化背景的符号空间的不均质性(多相性),它的整体性“不能借助单义固定的硬性规定范围来确定,并以各个方面体现在形形色色的人际交往情境中的某个主题‘情节’为基础。”^{[18](125)}

古谢夫在揭示了洛特曼符号域的特征,并对其认识能力作评价时,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1)为确保人们的共同性而创建的符号系统会不会将人自身排除出交际过程,并将他们变成某个类似在任何社会都存在的“角色功能”的东西? 2)人会不会越来越多地沉浸在符号空间中? 直到把自己完全封闭在其中? 要知道在作为最古老的世界观体系的神话中已经没有对周围现实的直接感知,神话中的自然已经被教化,作为“人化的自然”出现。^{[18](141)}

通过比较洛特曼和巴赫金对“文本”和“对话”的不同理解,我们可以发现洛特曼对第一个有关交际过程中人的问题的回答是很清晰的。正如我们已经指出过的那样,一方面是洛特曼强调交际过程的主体不是个人,而是语言,并试图从概念上模式化“交际行为背景”的整体性,即文化背景,但从另一方面看,人作为一个个体,作为一个存在,却没有参与这种对交际行

为(对话)的概念建构。巴赫金同样给对话中的文化背景赋予“对话者”的特殊角色,认为“话语是一出由三个角色参与的戏剧(它不是二重唱,而是三重唱)”。^{[19](301)}巴赫金与洛特曼不同的是,他突出了文本中的两极(结构和个体)。在巴赫金的对话中,有一种“活生生的体验意识”:“我深入领会个性……”“独特的历史真实存在要比理论科学的统一存在显得大且沉重,但对于活生生的体验意识来说这一非常明显的分量差别是不可以通过理论范畴来确定的。”^{[20](12)}而“理论世界是从我的独特存在这一事实和这一事实的道德意义中原则性地抽象出来的……”^{[20](13)}

对于洛特曼来说,重要的是创建一门精确科学的语言,因此他研究“机制”“非人格化”问题。交际主体不是单个的人,而是语言:进入对话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体立场(целостная позиция)。主体是经验性的,无论他是创造文本,还是接受文本,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只是某些结构特征的载体。理解一个文本并不是理解一个个体的存在,而是重构代码。

还有一点应该指出,即巴赫金和洛特曼不管是在提出人文知识的问题,还是在寻求其解决方案,都以各种不同的哲学思想为基点。巴赫金明显倾向于哲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而洛特曼,正如阿夫托诺莫娃正确指出的那样,是一个始终一贯的结构主义者。^{[11](136)}结构主义着手解决的是人文知识向抽象理论层面过渡的问题,众所周知,其哲学思想的目标在于向自然科学靠近,而它所特有的“反主观”倾向在很大程度上与反对存在主义和其他否

认人的客观认识能力的主观主义思潮的斗争相关。

第二个问题由古谢夫提出,是有关洛特曼符号域及其周围现实的。如果谈到洛特曼文化概念中符号域与自然的相互关系,那么相较于法国结构主义的经典作家列维—斯特劳斯(К. Леви-Строс),洛特曼的回答尤为明确。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在俄罗斯和法国同时得到发展,但各有各的特征。法国结构主义是在存在主义和个人主观主义思想失去其地位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具有非常明显的唯科学主义和普世的理想。俄国结构主义与法国结构主义不同,它把自己定位为科学方法论。在洛特曼的符号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探索自然科学式的科学方法论的目标。

在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中,语言和文化的范围整体上并不与自然相对立。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具有一般理性主义和唯科学主义倾向,体现在他努力创建能将人的感性和理性统一起来的理性主义的人的哲学。列维—斯特劳斯肯定现实的统一性:“……思想和世界……是同一现实的两种彼此相互关联的表现形式。”^{[21](642-643)}列维—斯特劳斯与存在主义者萨特(Ж.П. Сартр)以及将主体从自然中“剥离”出来的哲学思想传统进行了论战。列维—斯特劳斯有意将人回归自然:“结构主义重新使人纳入自然……”^{[21](652)}对于列维—斯特劳斯来说,语言结构就像神话中的无意识结构一样,揭示了整个现实的组织结构。结构无处不在——不仅存在于自然,而且也存在

于认识中,因为结构方法就是条理化的组织。无意识和认知遵循相同的规律。结构方法揭示了深层的结构,追求存在(统一现实)的真相。列维—斯特劳斯假定了认识论中先验论的自发性,这使里克尔(П.Риккер)有理由把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中的无意识称为“没有先验主体的康德主义”。

洛特曼与列维—斯特劳斯不同,他认为自然是注定超出某范围以外的现实:人完全沉浸在文化中,沉浸在符号域中。洛特曼对“自然”和“文化”的相互关系非常明确地形成了自己的理解:“在列维—斯特劳斯开创人类科学新纪元的著作之后的人类学中,确立了传统卢梭主义‘自然与文化’的对立,在这种对立中假定自然是首要的、初始的东西,而社会条件和其他人类活动的‘人为’结果对其施加了被称为‘文化’的限制。尽管这种观点看似自然和显而易见,但或许‘自然’这一概念本身就是文化所创造的对映体(антипод)的理想模型……”^{[17](9)}

在洛特曼看来,不仅仅是文化与自然相互对立,就连人的直接生活经验,要想成为文化的一部分,也必须先转化为文化,转化为文本,即必须通过一种复杂构造的内在机制——符号域(根据翻译的符号规则系统),由非信息转化为信息。洛特曼不止一次地强调,文本不是现实,因此,应该谨防将生活事件与任何文本相提并论,无论文本看上去多么“诚挚”“率真”或者“直接”。^{[22](330-337)}每一次选择要记住的事实都是在特定文化的某些符号规范的基础上实现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洛特曼符号学中的“现实”概念有两层含义。洛特曼强调,我们谈论的是两种“现实”:现象的(由语言结构组织的)和本体的(原则上超语言的)。按康德的说法,本体现实是注定超文化的现实。^{[23](5-6)}与列维—斯特劳斯不同,洛特曼对超符号域的现实的问题不感兴趣,尽管如他所指出的那样,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现实不能进入符号域的空间:“语言之外的空间进入语言领域,并仅仅作为内容—表达二分法的一个构成要素变成‘内容’。……事实上,这个问题与第二个问题——语言的动态本质融为一体。”^{[4](12)}

在符号学中,只有变成文本的经验才具有文化事实的地位。因此,被认为需要记忆的人类经验应该是:1)能作为存在被意识,也就是说,应该将其视为是语言中被记忆的结构中的某种要素;2)其次,它应该在该语言的所有层级关系中被评价。这意味着,它将被记录,成为记忆文本的组成部分,文化的一个元素。因此,将事实记入集体记忆,会显示出语言翻译的所有特征,在这种情况下,翻译成的是文化语言。^{[22](329)}

应该指出的是,洛特曼与列维—斯特劳斯不同,他特别关注历史主义问题,而这对于法国结构主义的经典作家来说毫无意义。列维—斯特劳斯认为,无意识结构(思维结构)的工作机制不会在历史的进程中改变,因为它们是由天性本身决定的,是人脑生物特性的反映。虽然这一古典结构主义的论点遭到了后结构主义的批评,特别是来自福柯(М. Фуко)的批评,他引入“历史先验”概念,认为结构是

由历史确定的,然而法国结构主义研究的还是本体论问题。

与将深层结构理解为历史先验的福柯不同,洛特曼创建了一种方法论,并提出了纯粹的类型学描述的元语言。洛特曼的结构主义是科学的,这位俄罗斯学者探讨了科学语言的精确性问题。而且,在洛特曼看来,方法并不试图发现所有现存(即列维—斯特劳斯假定的人与自然的统一体)的存在真理。在此体现了洛特曼的某种实证主义风格。元语言不应该与客体一致,它只是一种工具。

法国结构主义对人文知识向抽象理论层面过渡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笛卡尔—康德主义传统范围内进行的,但也受到了实证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响,这导致了这样一些二元论概念的提出,如列维—斯特劳斯的“没有先验主体的康德主义”,福柯的“历史先验论”。正如让—克洛德—米尔纳(Жан Клод Мильнер)所指出的,结构主义研究方案涉及到知识的基本问题,诸如自然和文化、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伽利略科学的理念。结构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分析经验主义材料的新方法,它还认为自己是一种整体的知识理论和哲学流派。^{[24](301-311)}

俄国结构主义将自己定位为科学方法论。对方法论和科学语言的兴趣是洛特曼思考的主线,因此他的实证主义问题域表现得比法国结构主义者更明显不是偶然的。众所周知,哲学实证主义是一种科学哲学。有人认为,这就是某些研究者称洛特曼为哲学家的缘由。^{[25](16-20)}毫无疑问,洛特曼的研究具有实证主义哲学

的风格,但称洛特曼为哲学家仍然太夸张。就这个问题我们赞同俄罗斯科学界权威的结构主义研究者阿夫托诺莫娃的评价: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俄罗斯,结构主义都没有成为一种哲学,它是一种科学方法论,同时具有一整套世界观。^{[26](936-937)}至于洛特曼,他仍然停留在科学问题上。另一个问题是他的概念体系的哲学子结构。如果谈到洛特曼的哲学取向和偏好,那么除了对理性主义思想传统的结构主义立场外,洛特曼还具有实证主义倾向。而且我们认同舍尔科夫尼科夫(А.Ю. Шелковников)的观点,他关注洛特曼的第二性模拟系统和作为新实证主义第二性模拟系统的科学语言分析的哲学观。^{[25](16-20)}

如果论及洛特曼在理解文化和历史的类型学描述的元语言时的实证主义倾向,那么将他的方法与在实证主义思想脉络中形成的文化和历史研究的传统相比较是很有意思的。众所周知,实证主义是一种广泛的现象,其地位显要。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对人文科学的形成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早在19世纪,实证主义哲学实验室就发展了不同的方法论(在研究语言、思维类型、心理结构、历史认知中)。20世纪20年代第三代逻辑实证主义或新实证主义形成。亨普尔(К. Гемпель)和奥本海姆(П. Опенгейм)转向对类型学方法的革新。^{[27](20-25)}人文知识受到了特别关注。在新历史主义框架内,人们试图提出历史规律和历史解释的功能问题。然而,在60年代实证主义进入了第四阶段——后实证主义阶段,其代表人物谈论

的不是历史规律,而是主体在认知过程中的不可消除性,而且不仅仅是在人文知识的认知过程中,在物理学和一般认知过程中也是不可消除的。在实证主义思想影响下,历史科学的语言学转向形成。持实证主义思想倾向的历史学家们批判了黑格尔(Г. Гегель)、马克思(К. Маркс)、斯宾格勒(О. Шпенглер)或汤因比(А. Тойнби)的“思辨历史哲学”,认为它是形而上学的一部分,因此无法验证。^{[28](5-6)}他们转而分析历史学家创建的文本。文本成为实证主义历史学家的基本概念。安克斯米特(Ф. Анкерсмит)、怀特(Х. Уайт)、韦恩(П. Вейн)等人从事叙事分析,分析生成文本的历史学家、文化史家的意识,他们的作品相继出现。安克斯米特像乌艾特一样从事元历史研究,并转向叙事逻辑分析。^[30]

洛特曼对历史主义的理解也是从文本出发:“历史学家注定要与文本打交道。文本介于‘真实发生的’事件和历史学家之间,这彻底改变了科学的状况。文本总是由某人出于某种目的而创作,而事件则以编码的形式出现在文本中。历史学家首先需要解码。对他来说,事实不是起点,而是努力付出的结果。他在努力从文本中提取文本外的现实,从事件的故事中提取事件时,本人也在亲自建构事实。”^{[5](336)}然而,洛特曼对实证主义的“文本批评”与历史学家的符号学阐释之间的根本区别表达得非常明确:实证主义文本批评关注的内容是在历史学家看来要么是对真相的有意歪曲(由于文本创作者的政治或者心理成见),要么是迷信和无知(没有文

化的想象物)的结果。^{[5](336)}“对于一个有对文献资料进行符号学阐释经验的研究者来说,问题显然是另一种情形,即必须重构文本创作者使用的代码(确切地说是一组代码),并建立它们与研究者的代码之间的关联。”^{[5](336)}

通过在交际行为的概念模式化中引入两种类型学,洛特曼提出了解决历史主义问题的另一种方案:他不是对个人主体(历史学家的意识)进行分析,而是列入第二主体—语言。建立在数学建模基础上的文化类型学描述的元语言使他能够非常独创性地提出历史主义问题:既考虑到了认知主体,又将其从科学语言中消除,以提高科学的客观性。

然而,形式化的科学语言相当纯粹,它不包含任何具体文化和具体历史时期的信息,是激进工具主义的一种变体。而用数学模型语言来表达通用的文化模式并不是它具备工具主义特征的原因。列维—斯特劳斯(和数学家 А. Вейль 一起)也用数学语言表达原型普遍结构,提出了“标准类型关系”公式。^{[31](181)}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他所发现的深层结构表达了存在的真理,但洛特曼与列维—斯特劳斯不同,他不从事本体论问题研究。作为符号学家,洛特曼对意义的功能和转换进行描述。意义从何而来、意义的永恒存在问题不在他的讨论范围之内。洛特曼类型学描述的元语言是一种认知工具,并不追求对本体论的探讨。但同时还应该注意,洛特曼一直在研究方法,并在与日益复杂的研究对象的接触中不断“精确和细化”其可能性。正如阿夫托莫诺娃所说:

“虽然洛特曼是结构主义的追随者,但他在方法的边界上下功夫,对其加以限制和延伸,揭示其新的可能性。”^{[11](136)}然而,文化类型学描述的元语言是有边界的,该边界决定于把握文化的独特性——文化的质的确定性的可能性(确切地说,是不可能性),也就是把握18世纪哲学中导致探索文化类型学那个问题的可能性,并最终形成了有机论的科学研究方案。

结语 类型学和不同文明对话的概念模型:认识的视角

仅仅研究洛特曼的概念,还不足以明白他的文化类型学描述的元语言在文化类型学研究中究竟提出了哪些观点。必须把它放在哲学和科学思想探索解决文化类型学问题的总的变化背景下来加以认识。

18—19世纪之交的德国文化哲学思想为文化类型学问题的形成做出了特殊贡献。赫尔德(И.Г. Гердер)在有机论(歌德路线)科学研究方案的框架内,提出了每种文化的有机整体性和独特性思想,以及文化的自我价值和自我目的性。法国启蒙运动认为人类总是不断向前发展进步的,并且所有文化和文明都具有统一模式,但赫尔德的人类历史哲学概念,通过论辩的方式反对这一思想。赫尔德及其后的德国浪漫派是欧洲哲学传统中摆脱欧洲中心论思想的先行者。此后,文化类型学话题就成为文化哲学和文化化学思想贯彻始终的经典话题,从而开启了至今仍在继续的对隐喻在概念和范畴方面的研究,因为隐喻可以表达文化的完整性和独

特性。类型学的分类单位是不可再分的具有完整性的单元(单体),以此为基础,可以使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宇宙结构化,而对其展开深入研究是文化化学最艰巨和最基本的任务之一。

一个问题的起源和历史对于其后续的发展总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文化化学形成的时候,彼得堡论战重启了18—19世纪之交形成的两种经典科学研究方案的竞争。如今,俄罗斯文化化学是一门正积极发展的学科。它从基本宗旨——文化的整体性和独特性及其自我价值和自我目的思想出发来理解文化的本质。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俄罗斯文化化学的两个相互竞争的科学研究方案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形成类型概念的逻辑:类型—系统整体性和类型—有机整体性(歌德路线)。但在这两种经典科学方案中尽管谈到了文化和文明的相互关系,然而洛特曼所研究的文化/文明对话的概念模型问题并没有被提出来。因此,可以有把握地说,洛特曼通过引入两种类型学(表达两种原则上不同的整体观),开辟了有趣而富有前景的基础研究和探索的方向。然而,与此同时,洛特曼对交际行为(对话)的建模方法也有局限性,一方面是由于其工具性特征,另一方面是作为普遍模式的类型没有概念性手段来表达文化存在的独特性及其形而上学的视野。我们不应该忽视古谢夫所指出的对话的两种不同类型:一种是导致其符号域结构化程度不断增加(逻各斯不断增强)的对话;另一种是可能超出自身界限、旨在揭示世界另一种结构的对话,这

种结构与自己的世界图景有着完全不同的构造方式。如果我们论及的文化 / 文明对话有可能超出自身世界图景的界限,那么这种对话就不可能运用洛特曼的文化类型学描述的元语言进行概念上的建模。这提出了一个有关洛特曼的类型学与以表达独特的形而上学视野为导向的类型学策略之间的互补性问题,而表达独特的形而上学视野从一开始就是有机论科学研究方案(歌德路线)的目标。在我们看来,在寻求歌德路线的进一步发展时转向胡塞尔(Э. Гуссерль)的物象理论是较有前景的。我们认为,胡塞尔的区域本体论思想在进一步深入研究文化类型学的概念系统方面会富有成效,其中的独特形而上学视野或者文化类型将在同一特定文化 / 文明的遗觉概念中得到表达。^[32(40-54)]

参考文献

- [1] Забулионите А.К.И.(науч.ред.), Ардашкин И.Б., Бадмаев В.Н. и др. Актуальность полемики Ю.Н.Солонина и М.С. Кагана.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ые основ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и (посвящается памяти проф. Ю.Н. Солонина, к 8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Ч.1[J] // Человек. Культура. Образование. 2022. № 4 (46).
- [2] Лотман Ю.М.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 должно быть наукой[J] //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7. № 1.
- [3] Лотман Ю.М. Об искусстве[M].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Искусство-СПб. 2005.
- [4] Лотман Ю.М. Семиосфера[M]. Москва: РГБ. 2009.

- [5] Лотман Ю.М. Семиосфера[M].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Искусство-СПб. 2000.
- [6] Пятигорский А.М. Некоторые общие замечания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текста как разновидности сигнала[A] // Структурно-тип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C].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62.
- [7] Лотман Ю.М. О семиосфере[M]//Ю.М. Лотман. Избранные статьи в 3-х томах. Том 1. Таллин: Александра. 1992.
- [8] Есперсен О. Философия грамматики[M]. Пер. с англ. Пассека В.В. и Сафроновой С. П.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и с предисловием проф. Ильиша Б.А.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8.
- [9] Лотман Ю.М. О семиосфере[A] // Ученые записки Тартуского гос. ун-та[C]. Вып. 641. Тарту: Тарту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1984.
- [10] Егоров Б.Ф.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Ю.М. Лотмана [M]. Москва: Новое лит. обозрение. 1999.
- [11] Автономова Н.С. Бахтин и Лотман: на подступах к открытой структуре... [J] //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2008. № 44.
- [12] Лотман Ю.М. К проблеме тип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изучения культуры[A] // Конф. «Проблемы типологии русского реализма», 10-12 мая 1967 г.: Тез. докл. и сообщ. Москва. 1967.
- [13] Лотман Ю.М. О метаязыке типологических описаний культуры [Препринт] [Z]. Варшава. 1968.
- [14] Лотман Ю.М. О метаязыке типологических описаний культуры[A] // Ученые записки Тартуского гос. ун-та[C]. Вып. 236. Тарту: Тарту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1969.
- [15] Лотман Ю.М. О метаязыке типологических описаний культуры[Z]. Париж. 1973.

- [16] Лотман Ю.М. Несколько мыслей о типологии культур[А] // Языки культуры и проблемы переводимости[С].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7.
- [17] Лотман Ю.М. Избранные статьи в 3-х томах[М]. Том 1. Таллин: Александра. 1992.
- [18] Гусев С.С. Смысл возможного[М]. СПб.: Алетейя. 2002.
- [19] Бахтин М.М. Эстетика словесного творчества [М]. Москва: Искусство. 1979.
- [20] Бахтин М.М. Философия поступка[М] // Бахтин М.М.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7-томах. Том 1. Москва: Русские словари;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03.
- [21] Леви-Стросс К. Мифологии в 4-томах[М]. Том 4: Человек голый. Пер. с франц. К.З. Акопяна. Москва: Флюид. 2007.
- [22] Лотман Ю.М. Избранные статьи в 3-х томах[С]. Том 3. Таллин: Александра. 1993.
- [23] Лотман Ю.М. Культура и взрыв[М]. Москва: Гнозис; Издательская группа «Прогресс». 1992.
- [24] Milner, Jean-Claude. Le Périple structural. Figures et paradigm[М]. Paris: Verdier. 2008.
- [25] Шелковников А.Ю. Ю.М. Лотман – философ [J] //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 XXI век. 2021. № 3 (1).
- [26] Автономова Н.С. Структурализм //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эпистемологии и философии науки[Z]. Под ред. И.Т. Касавина. Москва: «Канон+» РООИ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2009.
- [27] Забулионите А.К.И. Тип и проблема логики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знания[J] // Вестник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6 Философия, политология, социология, психологи, прав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96. № 1.
- [28] Анкерсмит Ф.Р. История и тропология: взлет и падение метафоры[М]. Москва: Прогресс-Традиция. 2003.
- [29] Уайт Х. Метаистор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воображение в Европе XIX века[М]. Пер. с англ. под ред. Трубиной Е. Г. и Харитоновой В. В.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Ураль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02.
- [30] Анкерсмит Ф. Нарративная логика.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языка историков [М]. Пер. с англ. Гавришиной О. и Олейникова А.; Под науч. ред. Макеевой Л.Б. Москва: Идея-Пресс. 2003.
- [31] Забулионите А.К.И. Типологический таксон культуры[D].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09.
- [32] Забулионите А.К.И. Типолог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тика в науке о культуре: основания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J] // Вестник Том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и искусствоведение. 2021. № 3 (43).

The Meta-language of Typological Descriptions of Culture in the Semiotics of Yu. M.

Lotman

A·K·I Zabulionite

Trans.by Guan Yue-e

Abstract The article deals with the formation of Y. M. Lotman's semiosphere

concept (theory of culture) and the meta-language of typological descriptions of culture. The peculiarities of Lotman's structuralism are analysed, its comparison with classical concepts of French structuralists (C. Levi-Strauss, M. Foucault) is carried out. Attention is drawn to Lotman's rethinking of the concept of text as an open structure (as the intersection of two points of view), which functions only when immersed in the semiosphere and implies the problematics of dialogue, the peculiarities of which are revealed in comparison with M. M. Bakhtin's concept of dialogue. It is noted that Bakhtin's subject of communication is the individual (existential position), whereas Lotman's is language (holistic linguistic position, shifting attention from the individual to culture). In comprehending the problem of historicism, Lotman sets the task of creating a strict scientific language of humanitarian knowledge (pure language of science that does not coincide with the object being described). The instrumentalist character of the typological meta-language of the language of cultural description is revealed. He proposes the idea of two typologies for conceptual modelling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heuristic possibilities and limits of Lotman's typological meta-language of cultural description are evaluat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search for typology of cultures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of philosophical and methodological thought, first of all, in two alternative scientific programmes: mechanicism (rationalistic, system-quantitative scientific programme) and organicism (qualitative scientific programme orien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conceptual apparatus sensitive to the uniqueness of cultures/civilisations).

Keywords Yu. M. Lotman, culture typology, meta-language, semiosphere, dialogue

(作者单位: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文理学院;
译者单位: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